

湘潭大学湘学研究所主办

湘学

(第三辑)

主编：方克立

湖南人民出版社



人学湘学研究所主办

湘学

(第三辑)

主编：方克立
湖南人民出版社

本辑编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方克立 王立新 王兴国

王继平 刘启良 朱汉民

李佑新 李建国 郭汉民

唐凯麟 熊治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湘学.第3辑/方克立主编.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4.10

ISBN 7-5438-3799-4

I. 湘... II. 方... III. 湖南省-历史-研究-文集
IV. K296.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8290 号

责任编辑:李雄伟
装帧设计:尹文君

湘 学(第三辑)

主编:方克立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编:410005)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政院印刷厂印刷

2004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4.5

字数:340,000 印数:1-3,000

ISBN7-5438-3799-4

G·895 定价:23.50元

前相对落后的湖南也一跃而成为后来的‘理学之邦’”。“因此，广义地说，湘学史就是湖南地区的学术思想发展史，特别是宋以后的湖南学术史，湖湘学派倡导的理学精神和务实学风一直贯穿于其中。”在对湘学研究对象的具体论述时，他还指出要把“湘中之学”与“湘人之学”适当地兼顾与整合，这种概括和论述给湘学研究指明了方向。

我们是严格地按照学理的意义或学统的意义即学术传承的意义来规定湘学，还是仅仅将湘学作为一种宽泛意义上的湖南这一地区的地域之学。这似乎还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因为这两者实际上是不同性质的两个概念。前者是指一个具体的学派而言，后者是就某一区域的学术状况而言。我想还是用后者来定义湘学比较合适。湖湘学派虽然在历史上盛极一时，但毕竟短暂而且影响也有限。如果我们不过分拘泥于某一固定的学统或某种既定的学术传承关系来研究湘学，内容就丰富得多。在这一点上夏君虞对“蜀学”的论述很可以为我们借鉴。他说：“宋学中的蜀学，通常只指言苏洵、苏轼、苏辙父子兄弟三人。”“不过，既谓之蜀学，当然以四川一省的学问为对象。苏氏一支固然是蜀学，苏氏一支之外的也不可略去不说。凡是四川人创造的，或者是别人创造而为四川人奉行的学问，可谓之蜀学。”“还有，虽不是四川人，而是奉行蜀学，或者说是学于蜀的，也不能不说是蜀学。”^①如果这样来看湘学，那么“湘中之学”和“湘人之学”就都可以纳入湘学研究的范围。

如果我们不以某种先入为主的观念为基准，只要是“湘中之学”或“湘人之学”，甚至是奉行“湘中之学”或“湘人之学”而有成者，都囊括在“湘学”之中来加以研究，这样可能反而会更加有利于我们更加真正找到或理解究竟什么是所谓的“湘学精

^① 夏君虞：《宋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93页。

神”。比如在对王先谦的理解上，我看就大可不必以其“非湘之所以为学”来把他排除在湘学之外。因为“湘之所以为学”的标准是什么，还没有定论。从《湘学略》中的“校经学略”、“诸儒学略”看，湘学应该是具有开放性与包容性的。

还有，对湘学的理解，由于很大程度上受到理学中湖湘学的影响，过去的研究多局限于哲学思想领域，最近朱汉民先生又出版了《湘学原道录》，这都是很有意义的论题，但是湘学即使是作为一个学术思想史概念，其内容除哲学思想之外，还应该包括文学、史学的内容，政治、经济、军事，还有佛学等方面也是湘学的重要内容。湘学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文化宝库，只有各个学科携手并进共同开发，才能够揭示湘学的全貌。

“湘学精神”与“南学”

如果纯粹按照地域来定义湘学，那么如何去把握湘学的特性或所谓的“湘学精神”呢？除了对湘学本身进行研究之外，还必须比较湘学与其他地域之学的关系。比如，屈原，当然也是“楚学”研究的对象，周敦颐也被列入江西学中，胡安国及其家族之学也被列入“闽学”渊源之中，而张南轩也是“蜀学”的研究对象。而且，南轩之后，湘学与事功学派、心学等的关系都十分密切。如果我们仅仅从理学或湖湘学来寻演湘学的特色，就像日本学者高畑常信在其《〈宋代湖南学研究〉序》中所指出的那样，很难将其与朱子学明确区分开来。当然，无论如何，湖湘学都是湘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湖湘学在宋明理学中的地位和意义，是很有意义的工作。关于这一点，《宋元学案》就已经有比较系统的整理。

李肖聃的《湘学略》中，在“紫阳学略第四”和“阳明学略第六”都拿日本的朱子学和阳明学来与湘学进行比照，这是很有

启发意义的。李肖聃曾留学日本多年，对日本儒学有深入的了解。在《湘学略》的“自叙”中，有“致维桑之深敬，阐南学之灵光”之语，“南学”一词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有多种意思，比如周代就有南学之说：“天子旦入东学，昼入南学，夕入西学，暮入北学。”^①“帝入东学以贵仁、入南学以德、入西学以贵义、入北学以尊爵”^②等等。到南北朝时代，经学分南北两派，被分别称为南学、北学。“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③，也有人说：“北学守旧而疑新，南学喜新而得伪^④。”到清末，维新派在湖南讲求新学，提倡变法，1898年由谭嗣同、唐才常等发起在长沙组织了一个学会，这个学会的名称就援用南学一词，叫做“南学会”。这里李肖聃所说的南学，指的大概就是湘学。

但是无独有偶，在日本儒学的诸学派中，也有一派叫做南学。这一点，李肖聃不会不清楚（至少在他所提到的井上哲次郎的《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一书中就提到）。日本的南学与湘学还真有不少相似之处。

作为南学发祥地的日本土佐，无论是从人文地理到历史风土都与湖南有许多相似之处。天武天皇（672—685年在位）时，在南国设立国衙，开设连接京城与国衙的官道，平安时代建成了横断四国山地的道路，而且也开始利用海路交通，都市文化艺术开始传入此地。自神龟元年（724）将土佐国定为“远流之国”之后，在奈良、平安时代就有许多名人被流放到此。延长八年（930）正月，著名歌人纪贯之赴任土佐守成为土佐的国司，

① 《易传·太初篇》。

② 《大戴礼·保傅篇》。

③ 《隋书·儒林传序》。

④ 阮元：《国史儒林传序》，《擘经室一集》卷二。

历时五年。他在回京途中写出著名的《土佐日记》，被认为是假名日记文学的先驱，是日本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其讽喻、自慰自照的特色，犹如屈子之《离骚》。而纪贯之于905年作的《〈古今和歌集〉序》更是日本思想文化史上的千古名篇。

作为“远流之国”的土佐，在豪族势力的保护下，文化得到了飞速的发展。镰仓五山文学之“双璧”义堂周信（1326—1389）与绝海中津（1336—1405）都是出自土佐。据说“土佐七勇”中的长曾我部氏，其远祖是秦始皇。室町时代末期，长曾我部元亲（1538—1599）曾统一土佐，平定了四国。直到1600年关原之战，长曾我部氏在土佐的统治才结束。

土佐南学是指在土佐传承发展的日本儒学的一个重要流派。南村梅轩（生卒年不详）于天文年间（1532—1554）携四书、孝经等传入土佐，被称为“南学之祖”。梅轩为“土佐七勇”之一吉良家族中的吉良宣经（1514—1551）之师。梅轩的教学以“存心、谨言、笃行三事为基”。其人格理想是“君子儒”，他所讲的“道义之学”是“讲习仁义之道，得心躬行，自纲常彝论之大，至起居饮食之细，幽而鬼神之道，显而至天地之理，周通无遗，其心活动，左右自在，当事接物，应机从变，无以涩滞，言行一致，心貌和同。事君父以此道，使臣妾以此道，推之至治国平天下，皆莫非此道”。如何从学呢？他说：“道虽广袤，其实备己，认得为己则弗繇贫贱而添减，弗繇利害而浮沉，确乎操定，是学问之效验也。”^①梅轩被认为是“大和民族中彼殆与王阳明同时出世，从程朱学人，自立一家之说，而达于王学的见地者”^②。而且梅轩学问的根柢未脱禅学之心法也可以想见。他曾说：“三纲五常之道真足以维持天地，诸子百家之学亦无可更改。但了悟

① 朱谦之：《日本的朱子学》，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3页。

② 朱谦之：《日本的朱子学》，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4页。

此心，未有若禅法者。心者身之主，万事之根也。心未定静以何辨事？”^①南学始祖梅轩虽属朱子学系统，但其思想中鲜明的阳明学和禅学的因素也不可忽视。

忍性、如渊、天室称为“梅轩门下三叟”，奠定了南学成立之基。长曾我部元亲也崇尚儒教，设立黉舍，聘任忍性、如渊为师，士风日振。天室为雪蹊寺（本来叫少林山高福寺，属于真言宗，长曾我部元亲将其改为临济宗，元亲死后成为其菩提寺，因元亲的法号改名为雪蹊寺）住持。其弟子谷时中（1599—1649）为南学中兴的重镇。南学的学风至此一扫禅学的心法而重视居敬之道，专宗于程朱之学。仰慕许鲁斋（衡）、薛敬轩（瑄）“存养践履”、“实行笃实”的学风。从学者甚众，而以小仓三省（1604—1654）、野中兼山（1605—1663）、山崎暗斋（1618—1682）最有名。1631年，藩主内山忠义起用野中兼山，执掌藩政30年，在政治、经济各方面大胆改革，全面展示了儒教的“外王之功”，使南学得到了广泛地传播。但也因此而引起了一些权贵的怨恨，野中兼山最后幽闭而死，而且整个家族也因此被视为罪人而流落他乡。野中之后，南学四散。

直到江户时代末期，土佐的学问才又有了新的起色。第十五代藩主内山丰信（1827—1872）起用吉田东洋（1816—1862），吉田家的先祖乃是长曾我部元亲的部将。吉田编辑《海南政典学》作为藩政的基准，设立文武馆拓宽知识的视野，阳明学开始得到公认。其《教场规则大意》中有一则即为：“欲知学问之主意及入手之次第，无如大学一书更为明备，然新本古本之异同纷然未定。今本之于身，莫若古本之著实切近。欲知古本之大旨，余姚王氏之大学问极为痛快，应以此为学徒从入之门，再顺次追

^① 井上哲次郎：《日本朱子学派之哲学》，富山房1923年版，第669页。

讲论孟中庸其他典籍。”^①而且对“洋学”也很重视。土佐的学风仿佛又回复到南学始祖梅轩的自由教学时代。正是这种自由的空气，使得从幕末到明治维新，土佐在各方面都人才辈出，如勤王志士坂本龙马（1835—1867）、自由民权运动领袖板垣退助（1837—1919），以及中江兆民（1847—1901）、植木枝盛（1857—1892）、马场辰猪（1850—1888）、幸德秋水（1871—1911）等思想家，岩崎弥太郎（1834—1885）等实业家，滨口雄幸（1870—1931）、吉田茂（1878—1967）等政治家。

就思想之活跃及其在各自文化中的影响而言，土佐之于日本，与湖南之于中国，同样是“远流之国”（《湘学略》中专辟“流寓学略”一章，论及学者达60人之多）而“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同样的“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之风气”^②。二者的确有许多相似之处。这里不可能细致地对湘学与南学展开论述，我的意思是说，要真正深入把握湘学的特质或所谓湘学精神，可以从多视角、多层次进行研究，不仅可以比较湘学与国内各地方之学的关系，而且还可以将湘学放在整个东亚儒学，甚至更大的背景下来理解。这样，湘学这种如杜维明教授所说的“有全球意义的地方知识”的特色就能够得到更加充分地体现。

要注意研究湘学的弱点

我们通常所说的湘学特性，往往是从积极的方面去理解。这

^① 笠井助治：《近世藩校的学统学派之研究》下，吉川弘文馆1970年版，第1494页。

^② 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导言》，岳麓书社1985年版。

固然很重要也很有意义。抱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来总结前人对湖湘学与湘学的批评，研究自身的弱点、揭一揭短以自醒，同样也有利于发展和弘扬湖湘学或湘学。

从学理上对湖湘学进行批评，最有代表性的当然是朱熹。朱熹批评“卒开湖湘学统”的胡宏的《知言》，作《胡子知言疑义》，虽然在心理上“亦惧颇有摭掇前辈之嫌”^①，“僭冒不韪、深以愧惧，但讲学之际，务求的当，不敢含糊，不得不尽言耳”^②。他坚持自己的学术立场，对自己的疑问，在另一篇《答胡广仲》的信中说：“惜乎不及供洒扫于五峰之门而面质之，故不得不与同志者讲之耳。亦闻以此或颇得罪于人，然区区之意，只欲道理分明，上不负圣贤，中不误自己，下不迷后学而已。它固有所不得而避也。”^③

对朱熹的挑战，湖湘弟子“偶无人能与辩论者”^④。是的，“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⑤。但实际上，这种学理上的是非，是可以争论的。五峰之说直到当代才有人为之加以“辩正”。张栻师事五峰，与朱熹齐名，《宋史·道学传》将朱、张并列，同为“一代学者宗师”。两者的关系，多有论述。如梁启超就将南轩视为“朱子的附庸”，认为“湖湘学派与朱子学派，实在没有什么区别”^⑥。而认五峰一系为“宋、明儒之大宗，亦合先秦儒家之古义”的牟宗三说，张南轩“天资明敏，心

① 朱熹：《答范伯崇》，《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九。

② 朱熹：《答胡广仲》，《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二。

③ 朱熹：《答胡广仲》，《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二。

④ 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三。

⑤ 毛泽东：《为人民服务》。

⑥ 梁启超：《儒家哲学》。

思活泼，看似通达柔和，而实禀性清弱，故其与朱子往复辩难，率多以朱子为主动，顺从朱子之格局。其所言说大都尾随其后而弥缝之，或时加转语，稍见清妙，未能精发师要，挺立弘规，故于朱子之格局，毫不能有所点拨也”。“此见其力弱才短，故软塌而被吞没也。其学无传，亦非偶然。朱子乐与之谈，而又深致赞佩之词，亦只喜其明敏而随和耳。”^①又说：“张南轩随朱子脚跟转，不能弘扬其师说；坚守五峰之说而不舍者胡广仲、胡伯逢、吴晦叔、彪居正等，又皆作品不存，年寿不永，学力才力亦恐有所不及，皆为朱子所驳斥。是则五峰所开之湖湘学统，为朱子所掩盖，人亦淡忘之。而不知其实蕴矣。”^②而日本学者高畑常信在解释湖南学在明代为出现后继者时，指出胡宏的“心学”与陆王的思想有相通之处，认为在陆象山与朱子的论战中“取代、消化了”湖南学与朱子的论战^③。

朱熹从自己的学术立场出发，认为湖南学“疏略”^④“无涵养”、“气局小，常汲汲然张筋努脉”^⑤，黄宗羲说也说：“湖南一派，在当时为最盛，然大端发露，无从容不迫气象。”^⑥尽管当时也有“深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⑦者，但是无论如何，为学如果不能“挺立弘规”、立定脚跟，就难免“若有若亡、不能得

①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56页。

②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0页。

③ [日]高畑常信：《〈宋代湖南学研究〉序》。

④ 《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三。

⑤ 《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一。

⑥ 黄宗羲等：《宋元学案》卷五十“南轩学案”。

⑦ 朱熹：《答刘公度》，《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六十四。

纯熟而气象浮浅，易得动摇”^①。“张筋努脉”的“霸蛮”，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也许会有作用，但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近代湘学已经与作为宋明儒学一个流派的湖湘学有了很大的不同。二者的关系，有的学者用“借香奉佛”一词来强调近代湘学只是“经常徜徉在湘学外显的成分中”“而不能对湘学的学理进行冷静而严密的思想研究”^②，这里所谓“湘学外显的成分”或“湘学的学理”所说的湘学，大概还指的是湖湘学。如果不走出南宋湖湘学的视野，我们研究出来的湖南地区的学术思想发展史即湘学史很可能还会被人讥为“气局小”、“无从容不迫气象”。因为以湘人为主而创立的近代湘学也有自己的“学理”及其外显成分。

本来，作为湖湘子弟，每每念及湖湘学非湘人所创造，而其在湘中故土也是昙花一现这段历史，便有一种非常复杂的情感涌上心头。同时更为自己对湘学“外行不入格”而深感羞愧。妄议至此，不胜惶恐。最后唯望“内行入格”者好自为之莫“成曲学”。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

① 朱熹：《答林择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十三。

② 王立新：《湘学称谓的历史变迁及其内涵》，《湘学》第二辑，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谈湖南人的“驴”脾气

刘鄂培

克立兄邀我参加“湘学笔谈”，论题之一是《湖南人的精神》。很抱歉，我虽是个湖南人，但离开这块故土已有半个多世纪了。先是在清华大学念哲学，毕业后，留在清华教中国哲学和中国思想史，可是，对“湖南人的精神”这个课题未曾涉及过。于是，在写这篇笔谈前，我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湖南人的“脾气”属不属于湖南人的“精神”？若依哲学来分类，世界无非是两大范畴：一是物质，一是精神。“脾气”并非物质，那么就非精神莫属了。虽然，湖南人的“脾气”不能涵盖湖南人的“精神”之全部，但是，拙文从湖南人的“脾气”来论湖南人的“精神”的一个侧面，也就不是离题千里的无稽之谈了。

上个世纪40年代末，我踏进了清华园。这时，在老师、同学中的湖南人真不少。我们这批来自湖南的人常被称为“湖南驴子”。初一听，很难入耳，久之也就习惯了。其实，这个称呼并非蔑称，而是昵称。因为湖南人干什么事都尽心尽力，从不懈怠，就像“小毛驴”那样憨厚诚实，天生的一副“倔”脾气。

什么叫“倔”？一般总是把“倔犟”两字连用，经过思索，我发现这两个字是有很大的区别的。“犟”，别人让你往西，我偏要往东；别人让你往东，我偏要往西。而“倔”，则是自己认定一个理，不论有多大的险阻，一直勇往向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前者，俗称为“对着干”。后者，俗称为“认死理”。

翻开中国近代史，近 100 多年以来，三湘的人才辈出。历史已证实岳麓书院的著名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并非是痴人狂语。

“时势造英雄。”三湘子弟之所以能在近代史中人才辈出，这主要是由于近百年来中国处于风云变幻的大变革时代。大变革时代必然造就出一大批英雄人物。但是，为什么在同一个大变革时代中，三湘子弟中出的英雄人物特别多？我想，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湖南人的“驴”脾气了。

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中国现代史中的伟大思想家、总设计师邓小平为振兴中国经济，提出了“改革开放”的光辉思想。当时，中国的经济遭到十年“文革”的严重破坏，人们的思想受到“国有经济”模式的禁锢。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实现改革开放无疑是阻碍重重，积症难治。

就在这关键时刻，1998 年，朱镕基“临危受命”出任总理之职，至 2003 年 3 月卸任。仅短短 5 个年头，中国经济就顺利地实现了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完成了“软着陆”；扩大内需增加出口，平稳地渡过了全球金融危机；稳定了物价，遏制了通货膨胀，促进了经济繁荣，中国的 GDP 出现了历史罕见的持续年增长 8% 的奇迹。朱镕基也就成为世界公认的经济学家。

朱镕基是湖南长沙人，1951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系，他的专业是电机工程。但是，他为什么能为中国的经济做出如此重大的贡献？为什么能成为世界公认的经济学家？这一方面，在于他天资聪颖，勤于学习，特别是在实践中不断学习、提高。另一方面，在于他具有浓厚的“湖南人的气质”。且听他在上任时接待中外记者会上的发言：

哪怕在前面是地雷阵，是万丈深渊，我将一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真是字字玑珠，掷地有声，铿锵有力。至今已时隔多年，言

犹在耳，仍感人肺腑。它体现出一种精神：一旦认识真理，就要坚持真理，无论困难、险阻有多大，竭尽全力，乃至牺牲生命，不达目的，永不停息。这种精神就是对“湖南人的气质”的最好诠释，这也就是本文所论的湖南人的“驴”脾气。

以上仅是一例。在近代、现代史中，凡有成就的湖南人物都有这种特殊的乡土气质。如戊戌维新的首要人物之一谭嗣同，他是湖南浏阳人。在变法维新失败后，友人劝他逃亡国外，并已作好了妥善安排。但谭嗣同拒绝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在临刑前，他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悲壮诗篇，从容就义。浩然正气，彪炳青史，至今仍为人们景仰。再如，晚清重臣曾国藩，他是湖南湘乡人。本是一介书生，不擅战事。从练湘军起家，初次出师即遭惨败，败而不馁。湖口一役湘军几乎覆灭，仍是败而不馁。最后，攻下了“天京”，取得了镇压太平天国的“胜利”。今人对曾国藩的功过，褒贬不一。但是，无论是褒、是贬，都认为曾国藩的成功是“屡战屡败”而又“屡败屡战”才取得的。这种“屡败屡战”的“毅力”也就是湖南人的“驴”脾气的表现。

在半个世纪之前，我对毛驴的“倔”脾气还真有过一次亲身的体验。那是在1949年的冬季，我还在清华大学哲学系念书的时候。全系师生踊跃报名参加京郊的土地改革工作。当时年过五旬的冯友兰老师和师母与我们几个同学分在一个工作组，地点在京郊卢沟桥。到这八年抗战圣火燃起的地方，来进行“平均地权”的土地改革，是多么激动人心！全组师生都是夜以继日地紧张工作，白天在广场上开会，冒着寒风、大雪；晚上足踏尺来深的积雪，走村串户，访贫问苦。天亮一起床，牙刷冻成了“冰棍”，毛巾成了“钢板”。但是，北国的严寒冻不住我们的一腔热忱。

三个月的土改，我们与农民同甘共苦，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工作结束时农民热情相送。那时农村还很穷，他们既没有汽车，也没有马车，只能派一辆毛驴车来送我们返校。

我自告奋勇，充当了驴车的车把式。鞭儿一挥，驴车迎着冬日朝晖前进。一路上车行顺利，的的嗒嗒的蹄声，配上毛驴颈上小铃发出的丁丁当当的响声，就像一首美妙的乐章。这时，我不惬意。谁知车过丰台之后，小毛驴的“倔”脾气发作了，它不顾我的口令，向公路右侧疾驶，“轰”的一声，连车带人翻倒在公路右侧的排水沟里。我立即爬了起来，扶起了冯老师和师母，拍去他们身上的泥土。幸好，沟不深，他们都没有受伤。我默默地站在冯老师的身旁，等待着他的训斥。一会儿，冯老师诙谐地笑着说：“我看，这个北方的小毛驴，听不懂你的湖南话！”意思是说，我用湖南方言发出的口令，毛驴听不懂。一场虚惊，却化为一阵欢笑。我第一次领会到冯老师的幽默、仁厚和大度。

从这一事件，使我加深了对湖南人的“驴”脾气的领悟。一个有“驴”脾气的湖南人，如果他所认定的“理”错了，而又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听不得半点不同意见，那么等待他的就是“翻车”。在中国近百年历史中，这样的事例并非罕见。

“驴”脾气不仅可以使湖南人成功，也可以使湖南人“翻车”。因此，对湖南人的“驴”脾气，就有必要一分为二。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用开放的眼光审视湘学

谷方

方克立同志发表在《湘学》第二辑上题为《湘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和意义》的文章，对有关湘学研究的几个重要问题，提出了很好的意见。他特别强调在湘学研究中坚持科学精神的重要性，主张采取“一分为二”的分析态度，从今天的现实需要出发，对湘学进行科学的分析，做到有“扬”有“弃”，把湘学改造、转换成为现代新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我相信，坚持这样的方向，湘学的研究工作一定能够健康发展，并不断取得新的成就。

“湘学”即“湘中之学”，指的是湖南这个地方产生和传承的一种学问。但是，湘学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从时间顺序上说，是先有湘学，然后才有确定的湖南省界。完全意义上的“湘人之学”是在湖南的省界确定以后才有的。

现在的湖南省，在《尚书·禹贡》所反映的夏代及其以前的地域中，它属于九州之一的荆州。春秋战国时期，它属于楚国。秦代设置长沙郡。汉代设置桂阳、武陵、零陵郡。三国时期，荆州一分为二，分属于蜀国与吴国。刘备死后，荆州为吴国所独占。西晋怀帝时设湘州，范围包括湖南及广东的部分地区。在唐代，湖南以及湖北、安徽、江西的部分地区划归江南西道。宋代设荆湖南、北路，范围包括湖南、湖北和广西的部分地区。元代“湖广行省”的辖区，除了现在的湖南全境以外，还包括湖北、